

## 認識鍾(叔河)先生

「走向世界叢書」是鍾叔河先生在80年代初編成的一套叢書，他把晚清最早走出國門的人，他們寫的遊記/日記/隨筆，匯編成叢書出版了，以至於像李普(1918.9-2010.11)這樣的老學人、大記者都會寫一封讀者來信寄給晚輩編者——鍾叔河(1931.3-)。那是1981年的夏天，他在信的末尾寫到「八月十八晨三時，半夜醒來，不復成寐，乃寫此信」。他如此急切地寫信，也是因為看了鍾先生編輯的「走向世界叢書」，深切地體會到「你寫這些文章，看了不少書，查了不少資料。不多寫點出來介紹給讀者，不是也很可惜嗎？再花一點功夫，也未必太費事吧？」

實際上，是很費事的！費到鍾先生不斷地努力，得罪了不少人。他白天在出版社編書，晚上回家查資料寫敘論，把那些難以理解的歷史背景、人物簡介寫給讀者。他太「努力」了，於是遭人討厭！鍾先生說：「長沙就像巴爾扎克(Honoré de Balzac)小說裏的『外省人』，格局小，是小地方出來的人；所以隨便你想做點什麼事都極其費力，得費力去說服他。」為了

想讓讀者明白每一本書背後的事情：他為什麼出國，出國的機會和原因？於是，就在每一本書前寫一篇敘論（導言）之類的文章。這一寫，最短的一萬字，最長的就寫成了四萬字的文章。特別是像鍾先生——古文底子厚實的編者，惜字如金，幾行字裏就蘊含了大量的信息。他寫了這麼多，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，那時也是拿不到稿費的，他不計較。因為他實在是是在寫作中，找到了一種樂趣，不僅是知識的樂趣，是他在書寫時，因思考而悟、修煉而覺的樂趣。這種樂趣，沒有任何物質回報，這點鍾先生自己就很清楚，他對我說：「做事寫作，是我生活裏的一部分，你說，寫東西，能掙幾個錢？生意做得好，不是掙錢容易得多？我也不是沒有能力去做生意的，就覺得那些事情沒有什麼意思。」但是，大多數人很難理解、接受他這樣的感受。有的「主管」和「領導」就不高興了：「我們不贊成搭車發表編輯自己的文章。」可是不寫，現在的讀者怎麼讀得懂這些舊文啊！要想趕緊把書出版，又不能跟他們有爭議，鍾先生會動他的小腦筋，把每一篇的敘論以筆名發表：「谷及世」（古籍室）、「何守中」（鍾叔河倒轉）、「金又可」（鍾叔河之半），他實在不想製造「搭便車」的嫌疑。鍾先生說：「我從來不習慣跟在領導屁股後面察言觀色，先意承志。領導想要出什麼書我就出什麼書，那我辦不到。」於是就有了這種特例，鍾先生自己選題，自己找書，自己編輯，自己加工，自己寫前言後記，自己設計付印。他大聲地告訴所有的人：「一句話，這是借前人的書講我自己的話，是我自己的編輯作品。」

鍾先生不愧為湖南佬，就是不來虛的。為什麼歷史上一直

被視為封閉、偏僻的湖南，卻出了那麼多奇特的文人，從曾國藩、郭嵩燾、沈從文一路走來？鍾先生對我們說：

湖南，清朝雍正年間才設省。湖南雖然不是政治意義上的邊疆，卻是漢文化的邊緣，所以沈從文才將湘西的小城鎮叫「邊城」。走向世界的思潮為什麼很早出現在湖南人身上呢？因為洋人是從廣東進來的，從澳門、廣州那些地方來的。湖南緊挨着廣東，洋人進來首當其衝，原來又是非常封閉保守的，那反差就特別明顯，反差特別明顯的地方衝突就特別強烈。我父親曾經告訴過我，他在進「時務學堂」之前，在很年輕的時候，就曾到湘江邊朝洋船扔石頭。有很多保守的人像我父親早年那樣的，逢「洋」必反。先知先覺的先進分子如魏源、郭嵩燾者，正是在這種充滿矛盾衝突的地方才會冒尖出來，「相剋相生，相反相成」，人才作育的道理正是這樣的。

當「走向世界叢書」要推出的時候，有的人又有意見，說是「一年最多讓你出四本」——聽聽，「讓你」，顯然是不喜歡他的「積極」態度，讓你出書，已經恩賜你了，怎麼還想多出？鍾先生是否表現得有點「出人頭地」了，他這是在幹什麼？可是在鍾先生看來，一下不推出十本以上，還叫什麼「叢書」啊！就這麼折騰來折騰去，書，還是陸陸續續出版了，成了那個年代的大事。著名學者李一氓（1903–1990）說：「這確實是我近年來所見到的整理古文獻中最富有思想性、科學性和創造性的一套叢書。」

在完成張德彝<sup>1</sup>註的《三述奇》後，張家的後代，在石家莊市第十五中學任教的孫子張祖銘，充滿感激地寫信對鍾先生說：「先祖遺物，除送交國家者外，由於眾所周知之原因，業已蕩然。……若無先生之努力，先祖遺作恐亦無人能知，湮沒於世矣！」

80、90後的孩子，估計並不知道什麼是「眾所周知之原因」吧？我們的時間在日子裏常常是被掩埋了，日曆也總是缺頁的。寒天歲月，為了補上這殘缺的一頁，1979年底，鍾先生跨出淞江勞改農場的第一步，就是踩着殘雪去北京圖書館尋找資料，在雍和宮那裏的戲樓胡同二號，終於尋覓到張德彝八部《述奇》的抄本，其中包括了最有價值的《三述奇》。

張德彝一生八次出國，每次都完成一部日記體裁的「述奇」，而他的《三述奇》正趕上普法之戰與巴黎公社革命。鍾先生的文章裏介紹說：

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二年，張德彝作為崇厚的譯員，隨崇厚到法國處理天津教案遺留問題。他們到馬賽時，普法戰爭已經開始；到波爾多時，巴黎公社的革命就爆發了。張德彝奉命先去巴黎，在巴黎親歷了這一場翻天覆地的大事變。他在《隨使法國記》中，逐日記載了在巴黎、凡爾賽等處的見聞。「走向世界叢書」根據張氏家藏稿本，把唯一一部中國人寫的巴黎公社目擊記貢獻給了讀者。書中有很多珍貴的史料，如巴黎被圍時用氣球和城外聯繫，爭奪布爾日村(Bourges)的戰鬥，拆毀旺多姆圓柱(Vendôme Column)

的現場，外國人眼中的被俘女戰士……毫無疑問會受到研究法國政治史和巴黎公社史的學人的重視。

1918年張德彝去世時，他慎重地把自己的稿本交給了次子張仲英保存；到1951年的時候，張仲英也覺得自己老了，沒有這個能力保存，乾脆將它們捐贈給國家。最後，這些稿本幾經週轉，收藏在北京東北角一條叫戲樓胡同1號的柏林寺裏。寺廟早就不見蹤影，沒有恢宏的建築，只有一道舊木門，上面貼着鐵皮的小門牌號，除此之外什麼都看不見。是在北圖工作的老先生，西南聯大畢業的圖書館員——張玄浩先生的帶領下，鍾叔河去到了那個地方。僅僅是「西南聯大」幾個字，就讓我們肅然起敬，老先生的學問一定不可等閒視之，他看見鍾先生在尋找卡片時的專注、認真。聽說他想出版「走向世界叢書」後，熱情幫助，立刻畫了路線圖，讓他趕去柏林寺查找。又怕鍾叔河有困難，自己都是上了年紀的人，隨後卻騎着自行車從老北圖趕來，查找了好幾天，終於找到了線裝78卷本的《述奇》原稿，它們被藍色布函護封得完整無缺。

鍾叔河幽默地在他的《柏林寺訪書》的文章裏描述到：

柏林寺——北京圖書館分館。此處位於北京內城東北角，原是一座以藏經著名的古剎。但建築和人一樣，它的時運並不因肚裏的書多少而轉移，很久以來，這裏的香火就衰落了，遠不如鄰近的雍和宮。那裏是雍正皇帝的「潛邸」，又有表現人獸交媾的歡喜佛可看，故能吸引多多的善男信女。四九年以後，柏林寺沒有能夠作為佛教勝地

保存下來，卻因為有幾楹藏經樓可以利用，便成了一處存放古籍的地方。

（鍾叔河《小西門集》）

柏林寺的工作人員，都帶着老舍筆下老北京人的特點，操着最禮貌的語言：「您走啦，走好嘞，您明兒早來！」屋子裏沒有空調暖氣，工作人員的棉褲角紮得緊緊的，穿着老式的黑色蚌殼棉鞋，升煤爐燒開水，弓着腰為鍾先生倒水，搪瓷缸上的搪瓷脫落了，可是他們把茶葉放進去，沖進滾燙的熱水，當杯子上冒起熱氣的時候，再寒冷的冬天，都被他們的禮數所溫暖着。他們有教養、有禮貌且為人謙虛。

北方清晨的寒氣，透着乾冷的清爽，這讓鍾先生記憶猶新，特別是在那破舊的樓房裏，藏着這麼多珍貴的古書，讓人無法不流連忘返。從月壇的北小街招待所出發，橫穿整個老北京城，在那些躺着的線裝書裏，終於為讀者尋找到時間，為我們缺頁的日曆打上了小小的補丁。大早進門，最後一個離開，真的是「戀戀不捨」！多少年以後，張玄浩先生早已作古，但是鍾先生還與他的女兒保持着聯繫！

難得的「走向世界叢書」，留下了多少老人付出的心血，錢鍾書先生一眼就看見了。當他看到每本書前的敘論時，覺得非常有意思，雖然他都不知道從哪裏冒出來一個叫「鍾叔河」的，他的古文、國學底子是怎麼修成的，但還是覺得文章寫得好看。於是錢先生關照《讀書》雜誌的董秀玉，如果鍾叔河什麼時候從長沙到北京，帶去他家見見。這太讓人匪夷所思了。

錢先生不要見人是大名在外，那些描述是非常仔細的，他家的門上，掛着小鏈條，敲門以後，門是打開了，但是主人隔門縫朝外看，那小鐵鏈就拉開了主人和外人的距離，多數的來者都被拒之門外。怎麼就這個剛滿50的鍾叔河，他的文章、文字會讓錢先生產生興趣？他邀請鍾叔河做客不算，見了面還鼓勵他，把那些敘論集結單行，並表示願為之作序。[見書信二、三]序言的開頭是：「我首次看見《讀書》裏鍾叔河同志為『走向世界叢書』寫的文章，就感到驚喜，也起了願望。」這個願望就是錢先生給鍾叔河的信上說的：「弟素不肯為人作序，世所共知，茲特為兄破例，聊示微意。兩週來人事瑣集，今急寫就呈上，請閱正。」

在年輕的鍾先生面前，信箋上，錢先生按舊式禮貌的習慣，稱自己為「弟」，也嚇了我一跳。多年以後，楊絳先生收到鍾先生寄去他的新書時，錢先生已經去世多年，她在給鍾先生的回信裏說：「他（錢鍾書）生平主動願為作序者，唯先生一人耳。」

在這些「名人」的讚美之下，領導們也不再給鍾叔河「提要求」了，「走向世界叢書」和《走向世界——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》都順利出版。那些筆名也得到轉正，正大光明出現著名的名字——鍾叔河。

等到我閱讀錢先生的序言和《走向世界——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》時，已經是二十年以後的事情。無地自容，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在北京讀書，卻不知道有這樣一套叢書！更不知道有一個叫鍾叔河的學者。現在，我老老實實地讀，讀完

了以後，又買了好多本送朋友，因為我交的也是一些沒有讀過這書的朋友，甚至做歷史研究的朋友（雖然做的是日本經濟史研究），對於中國歷史，我們都缺少基本的認知！真想把微信上的那些小貼圖，那個流淚或者是焦慮紅臉的形象貼在自己的文章裏，一份很深的羞愧感。

朋友認真看完書以後，立刻給我打電話，她說：「我不同意鍾先生說的，這不是第一次中國人出國對國外的描述和認知，早在中世紀的時候，就有中國人漂洋過海了。」我一聽，覺得朋友說的有道理。這就是我們這些缺少常識、看書抓不住重點的人的「思考」。直到很久以後，我問鍾先生這個問題時，他只用很簡單的一句話就回答了我：「是的，這不是國人第一次漂洋過海；但這是第一次，國人用文字記錄下了他們到歐美後的所見所聞！」

看完這本書以後，我開始把鍾先生出版的書，一本一本地買回家閱讀。每次放下書，抬頭看去，總是看見那個身材魁梧的人，站立在你面前，他踩着左—右—左的步子，有力堅定，跟隨着隊伍中一個個挺胸闊步的戰士在朝前走。我窩在台階上看書，操場上列隊整齊的年輕人，加上那響亮的口號聲，讓人會不由自主地站立起來，向所有邁着正步的人舉手敬禮。人，就是這樣被環境感染和改變，我一點都不覺得自己愚蠢，我甚至比走正步的鍾先生更有一種儀式感，莊嚴得匪夷所思。只是有一天，我站立在鍾先生邊上，與他合影的時候，突然發現他不是那麼高大，我的個子幾乎都快和他一般高低。我怎麼也不

會想到，這個古文底子那麼深厚，對歷史有着深切理解的人，曾經也是一個激進、天真，甚至單純得有點愚蠢的陽光少年。

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夏在長沙讀書，那時我被視為左傾學生；到一九五七年，卻成了右派分子。這看似奇怪，其實正常。國民黨的確太腐敗太黑暗了，我感到不民主不自由，很不喜歡它，共產黨在地下一鼓動，就帶頭罷課，帶頭上街遊行，自然成了左傾學生。一九五七年在共產黨的報社裏，我仍然要民主、要自由，於是又成了右派。想起操場上齊步走情形，不禁感慨係之。

（鍾叔河《左右左·左右左》）

我哈哈大笑之後，還是會想到鍾先生1949年在「留校護校」的運動中，和三青團幹架的事情，至今他的右眼眉宇之間，留着舊傷疤；作為當年左傾學生，為他留下了一個記憶的念想。聽鍾先生說話，總是有一份幽默感。他在那裏東拉西扯，苦難也變得滑稽。他從來不笑，一張冷漠的面孔，可是說到最後一句結束語時，談話一定落實在一個思考點上，明確、簡單且清晰，它直指事物的本質。我們的笑聲戛然而止，需要開始認真地思考。

是看了太多鍾先生的書，實在忍不住想給他寫信，因為鍾先生不也是那種會給作者寫信的讀者嗎？一次一次跟朋友敘述着，我從鍾先生文章裏看來的故事。上個世紀60年代初，被打成右派的鍾先生在長沙城裏拉板車，一天就是那麼幾毛錢的

收入。有一天在歇腳的功夫，他在街頭的舊書攤上，看見一本書《希臘的神與英雄》，隨手拿起來讀，讀着讀着，不僅忘記了勞作的辛苦，竟然讀出了彷彿周作人的氣息，那文字的韻律還有那種境界。他把一天拉板車的收入全部付上，買下這本舊書，作者叫周遐壽。他不知道這個人是誰，問朋友，朋友也不知道，於是讓朋友給出版社寫信，出版社是很負責的，他們把信轉給了作者。誰都不會想到的是，作者回信了，這才知道周遐壽就是周作人。

我不斷地跟朋友說這個故事，說得越來越細節化，以至於我甚至看見鍾先生拉板車時，滿身滿臉的汗水，衣衫不整的樣子。我自己都被這個故事感動得熱淚盈眶，因為誰都沒有想到，周先生在天之靈也不會想到。三十年以後，正是這個拉板車的，將周作人的散文集，在1949年以後第一次集結出版，這個板車夫是怎麼完成的。我常常會想，如果拍成電影，要下怎麼樣的功夫，才可以將這個充滿戲劇化的故事，讓觀眾信服？！這靈魂上的交流，會給予觀眾什麼樣的衝擊啊？當時間、生命和死亡在一條平行線上拉開的時候，遠在天上的周作人會有這樣的期待嗎？生活裏，原來並不需要那麼多「傳奇」，幸福的生活應該是平庸的，而他們這些大師，為這些「傳奇」付出了殘酷的代價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跟鍾先生對話的時候，他在電話裏告訴我：「不是這樣的。最早給周先生寫信的是張志浩，是批判胡風以後的事情，還沒有開始反右。我看見一本舊書，叫《希臘

的神與英雄》，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，再版的時候，就給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了，作者叫周遐壽，這是周作人早年的筆名，當時我不知道。所以，你說我有學問，我連他的筆名都不知道，我哪裏有什麼學問啊！我就覺得這個書的文筆好，但是那些阿波羅啊、神們的名字啊，翻譯得都和我平常看見的不一樣，我很奇怪。我就通過總編室的張志浩給出版社寫了信，因為我在財經組，我寫信就不方便嘛。然後出版社，就把這封信轉給作者，我這才知道，是北京新街口八道灣13號周作人。你可以去看《青燈集》，第27頁上，『三封舊信』，這個事情寫得比較清楚！」

網上買不到《青燈集》了，我去「上圖」找到了這本書。再看一遍，還是感動！

跑舊書店是鍾先生的一大嗜好，他說，當了「右派」以後，變得更加「肆無忌憚」了，因為沒有人、沒有單位管了。那個被我描述成用「一天的拉板車的錢換來的周作人的書」，是我感動以後杜撰出來的，但也不完全是我瞎編，一定在哪裏看見過這情景。直到重讀《小西門集》時，才確定是鍾先生在舊書店買書的故事。他在那裏看見了周作人的《苦竹雜記》，不是歇腳在馬路上的地攤。那會兒舊書店裏的書，一般都是三毛錢一本，但是這本書開價竟然是五角。鍾先生拿不出錢，他轉身就跑到隔壁的舊貨店，毫不猶豫地摘下頭上唯一像樣的呢氈帽，人家說：「這帽子也就值一塊錢，回家拿戶口簿去吧！」鍾先生着急，怕回家以後，《苦竹雜記》就被別人買去了。他說：「帽子，就作九毛錢賣給你吧！」因為一元以下的舊貨，

是不需要戶口簿的。書，總算是買到了。畢竟是1949年以後，市面上，即使是舊書店，也不是那麼容易尋覓到周作人的書的，如果依然在單位供職，鍾先生說，他會猶豫着，是否要將它買回家。

現在，鍾先生手上不僅珍藏着周作人的書，還有他家的地址，於是距離上次寫信五年以後，1963年深秋，他又給老先生寫去了一封長信。那已經不是讀書的年代了，階級鬥爭天天講，運動一個接一個。黑暗中，鍾先生依然在拉完板車以後，燈下讀着周作人的書。為了給周作人寫信，這個「勞動人民」手無寸紙，為了表達自己的虔誠，特為跑到家對面的小店裏，買了幾張一面光潔一面粗糙的「材料紙」，又買了一小瓶墨汁和一枝最低廉的羊毫筆，用老式豎寫的格式，給周作人寫了一封信，並且得到了先生的回覆。

那時候誰都不會把這些東西保存下來，現在說給人家聽，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，太像天方夜譚裏的故事了。鍾先生沒有向周作人做任何解釋，只是說自己「迫於生計」，無法購置稍微合適的紙筆，周作人沒有詢問，而是給他回信，在那個年代，鍾先生並不願意提及此事，因為這多少是有點危險的；但是在籌備做《周作人散文全集》時，他和周豐一（周作人的兒子）常聯繫，有次周豐一發現了近三十年前的鍾先生去信的手跡，複印以後便寄給他了。[見書信四]

周老先生：

從友人張志浩君處，拜讀先生手書及大著二種，得知先生仍然很康健，十分高興。

從三十年代我初讀書時起，先生的文章就是我最愛讀的中國的文章。二十餘年來，我在這小城市中，不斷搜求先生的各種著作，凡是能尋到的，無不用心地讀，而且都愛不能釋。說老實話，先生的文章的美，固然是對它具有無上的吸力的，這卻還不是使我最愛讀它們的頂主要的原因。

我一直私心以為，先生的文章的真價值，首先在於它們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態度，乃是上下數千年來中國讀書人所最難得有的態度，那就是誠實的態度——對自己、對生活、對藝術、對人生、對自己和別人的國家，對人類的今天和未來，都能夠冷靜地，然而又是積極地去看、去講、去想、去寫。

不論是最早慷慨的〈死法〉、〈碰傷〉等文，後來深遠的〈家訓〉、〈試帖〉諸論，甚至就是眾口紛紛或譽為平淡沖和或詈為「自甘涼血」的「茶食」、「野菜」那些小品，我看起來全都一樣，都是藹然仁者之言。

先生對於我們這五千年古國，幾十兆人民，婦人小子，愛是深沉的，憂憤是強烈的，病根是看得清的，藥方也是開得對的。二十餘年來，中國充滿了各種事變，先生的經歷自是坎坷。然而公道自在人心，即使不讀乙酉諸文，我也從來不敢對先生有何怨責，不幸的只是先生數十萬言為之剴切陳詞的那些事物罷了。

我最引以為恨的，就是雖然經過刻意搜求，先生的一些文集仍然無法看到。如今我所藏的，不過是《自己的園

地》、《雨天的書》、《知堂文集》、《苦茶隨筆》、《夜讀抄》、《瓜豆集》、《風雨談》以及解放後幾冊回憶錄而已。此外還有兩本從前上海野雞書店胡亂編印的集子，實在不能算數，只因為有上述各書不收的文章，也在珍藏之列。先生究竟老了，我輩迫於生計，也無法多尋書讀書，看將起來，這恐怕將會成為永遠難償的心願了。假如先生手邊尚有存留的文集，無論舊印新刊，能夠賜寄一冊，那就足以使我歡喜萬分了。

此外，我還想學志浩君的樣子，求先生為我寫一條幅，字句就用先生無論哪一首詩都好。先生最喜歡的藹理斯的那一段話，用在這裏也許適合，先生就請把它當作交給別人手裏的一支火把亦可耳。

回示請寄 長沙市教育西街十八號。敬祝

康健！

鍾叔河 十一月二十四日

無法購置稍微合適的紙筆，要請先生原諒，又及。

一封長信，在那樣的年代，給這樣一個漢奸寫了如此深情的信，他就不懼怕？這讓我困惑了很久。有一天，看着我的父親留下來的舊書裏，發現裏面有一張讀書卡片，日期也是在上世紀60代初期，在頁20上，他同樣是抄下周作人的句子：

周作人 / 人的文學

我所說的人道主義，並非世間所謂「悲天憫人」或「博